

上海城市社会变迁丛书

近代上海的分娩卫生研究

(1927 — 1949)

赵婧著



JINDAI
SHANGHAIDE
FENMIANWEISHENGYANJIU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城市社会变迁丛书

近代上海的分娩卫生研究

(1927 — 1949)

赵婧著



JINDAI
SHANGHAIDE
FENMIANWEISHENGYANJIU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上海的分娩卫生研究:1927~1949/赵婧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12

(上海城市社会变迁丛书)

ISBN 978-7-5326-4120-8

I. ①近… II. ①赵… III. ①分娩-研究-上海市-
1927~1949 IV. ①R7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5530 号

本书获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资助

上海城市社会变迁丛书

近代上海的分娩卫生研究(1927—1949)

赵婧 著

责任编辑/刘琼 封面设计/姜明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辞书出版社出版

200040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www.cishu.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20.25 插页 1 字数 244 000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4120-8/K·946

定价: 50.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66700301

总 序

熊月之

上海近代历史，有一个特点，我们对其拥有的资料越是繁富，思考得越是深沉与持久，它在我们心中唤起的惊奇和兴味就越是历久而弥新，这就是笔墨难摹的复杂性。

这里有三类市政机关，三个司法体系，四种司法机构（领事法庭、领事公堂、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庭），三个警察系统，三个公交系统，三个供水系统，三个供电系统，电压有两种，法租界是 115 伏，公共租界是 220 伏，有轨电车的路轨宽度也分两种。

假如有人想从南京路乘电车去中国城里的某个地方，他必须先乘英国电车到租界边的爱德华七世大街（今延安东路），接着穿过马路进入法租界，乘法国电车到南头，然后穿过民国路，再乘中国电车继续前行。在这趟半个多小时的路途上，首先可看到的是穿着英国警察制服的英国人、白俄人和印度锡克族人，然后是穿着法国警察制服的法国人、白俄人和越南人，最后是中国警察。^[1]

这里人口多元。国内人口八成以上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湖南、山东等 18 个省区。同乡会是他们最熟悉的组织，同乡是他们最亲切的关系，名目繁多的会馆、公所，为同乡寻

找工作、排解纠纷、申诉冤屈,安排子女就学、看病就医,办理婚丧嫁娶之事,发挥重要作用。千姿百态的地方话、地方菜、地方戏,成为各路同乡认同的重要标志。外侨人口最多时超过 15 万,所属国籍与民族最多时超过 60 个,包括英、美、法、德、日、俄、犹太等。各种总会是他们最重要的社交场所,包括以英国人为主的上海总会、美国总会、法国总会、德国总会。日本人则自成社区,讲日本话,住日式房屋,吃日本料理,建日本神社,办日本学校,出日文报纸,将虹口地区建成了“小东京”。

这里货币多元。外国银行由于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获得在中国发行货币的权利。几乎所有重要的列强都在上海设有银行,发行过货币,确切可计的有 18 家,其中英国 4 家,美国 3 家,日本 2 家,法、德、荷、比各 1 家,还有 5 家是合资银行。它们发行的各种面值、各种文字、各种颜色、各种图案的纸币,英国女王头像、孙中山头像、自由女神像、赵公元帅像,同时出现在上海货币市场上,光怪陆离,莫此为甚。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城市,哪怕是伦敦、纽约那样的国际性金融中心城市,能够像这里有那么多品种的货币流通!

这里教育多元。除了国人官办或民办的学校之外,有教会办的,租界工部局、公董局办的,外侨团体办的,有在美国注册、用英语教学和考试的,如圣约翰大学,也有用法语、俄语、德语、日语教学的,学制、教员、教科书、教学方法、毕业文凭五花八门。

这里宗教多元。宗教门类之多,教务之盛,信徒之众,均为全国其他城市所罕见。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等五大宗教在这里都相当繁盛。这些信仰系统来源各异、形成历史长短不一、信奉对象千差万别、教堂样式千姿百态、礼拜仪式形形色色、节日庆典斑驳陆离的宗教,如果散布在世界各地,每个地方都自成一风景线,一旦汇集到一个城市,那就是众神毕至、群仙咸集、各显神通、

各呈异彩的名副其实的宗教博览会。

人口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必然带来节假日多元、风俗多元。一些多民族人混处的机关、团体、学校，为了照顾各自的宗教信仰，放假的节日就特别多。比如，圣约翰大学就中西节日兼顾，在春节、端午、中秋节要放假，在受难节、复活节、升天节、感恩节、圣诞节也要放假。

至于语言多元、报刊多元、饮食多元、服饰多元、建筑样式多元、娱乐方式多元，早已为人们所习知，毋庸赘言。

这些多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近代上海处于中外两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处于多种文化影响的复合区域。

这里处于中国权力控制的边缘地带。租界虽是中国土地，但受治外法权保护，中国地方政府不仅不能管辖作为上海城市主体的租界里的外国人，连对租界里的华人也没有充分的管辖权，不能随意征税，不能随意拘捕，不能随意审判。

这里也处于英、美、法等国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公共租界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里权力主要控制在英国人手里，但是，它不等于香港或新加坡，工部局总董不等于香港总督。工部局总董由租界有关居民选举产生，并不需要向英国政府或英国驻沪领事负责，也不一定总要听从英国领事的意见。法租界的情况有别于公共租界，但法租界与法国政府的关系并不是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

这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如果仅出现在一个租界与华界之间，那还比较简单，而出现在两个租界并存、三个政权同在的情况下，就更为特殊，对于英国、法国、中国等权力控制系统来说，也更为边缘。俗话说：“天高皇帝远”，上海租界距离英国、法国、中国权力控制中心都特别遥远。

这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如果出现在政治体制相近、司法理念相

近、价值观念相同的情况下,那还比较简单,其间的差异会较多地体现为利益的不同、立场的不同。但事实是,英华、法华之间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既大异其趣,英法之间又曾为宿敌,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也有很大差异。这样,在华界与公共租界、华界与法租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事实上存在三道行政控制的缝隙,整个上海便成为全世界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异质文化交织的特有区域。

近代上海城市的这种复杂性,复杂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以至于后来的研究者对其作任何简单的概括、断语都是一种冒险,都可能失之偏颇。你可以说它是黑色的染缸,我可以说它是红色的摇篮;你可以说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我可以说它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你可以说它摩登,我可以说它传统;你可以列出一百条理由说它是罪恶之渊藪,我也可以列出一百条理由说它是文明之窗口。红与黑、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反动、世界性与地方性……几乎任何两极对立的判断,对上海来说都能成立。只有一种判断不会招致反驳,这就是:极其复杂。

近代上海城市的这种复杂性,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这首先表现在她的文化交流功能。近代上海很像一个袖珍地球,全世界不同民族文化,英、美、德、法、俄、日、以色列、印度……全中国不同地域文化,南起香山、潮州,北到齐鲁、幽燕,东起江浙,西迄川湘,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民俗,都到这里来一展风采,互相交流、融合。说她像一个袖珍地球,而不是世界文化博览会,因为很多外侨是这里的居民,而不是过客。居民与过客不同,居民有长久性,有认同感,长期居住在上海的英美人自称 Shanghailander,直译就是上海人,过客则呈临时性,无认同感。因为是居民,所以,他们

引进电灯、电话、自来水、抽水马桶,首先是自己欣赏,满足自用,而不是为了炫耀、兜售。其结果也有宣传作用,但这种宣传不是灌输式宣传,而是示范式宣传。灌输式宣传是我说你听,俯视式的,示范式宣传则是我做你看,平视式的,后者更能让受众心悦诚服,自觉接受。

这也表现在她的唯一性。放眼世界,盱衡古今,从古希腊到新大陆,从亚细亚到欧罗巴,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成千上万,有哪个城市会如此复杂?绝对没有。纽约、洛杉矶、巴黎等,也都是多民族移民城市,也都是多元文化,异质文化交织,但是,它们都不是行政机构多元、司法系统多元、交通系统多元、货币多元,在异质性程度方面,都远远不能与近代上海相比。

这还表现在她的不可复制性。道理很简单,近代上海之所以会出现一市三治,出现如上所述的那么多的多元,是以中国政府丧失对租界的行政管辖权、司法权、教育权等为前提的,是以不平等条约为后盾的,任何一个独立国家都不会以丧失对一部分领土的主权来进行这种复制。

这种不可复制性还在于,它的形成过程也不可复制。租界作为“国中之国”,并不是某个人、某个国家主观设计出来的,具有不可逆料性。治外法权是租界产生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西方列强在中国共设有 26 个租界,在许多城市享有治外法权,但没有哪个租界、哪个城市出现像上海这样复杂的情况。如果没有小刀会起义、没有道台权力失控、没有华洋混处,上海租界的形态就不会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那个样子,而小刀会起义、道台权力失控、华洋混处局面出现,都是彼时彼地、国际与国内、中央与地方、内政与外交、政府与人民、现实与历史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

20 世纪 30 年代,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北京大学教授曾觉之,从不同文化的并存、融合和新文化产生的角度,对上海现象进行分析,认

为上海将成为人类新文明的中心之一：

人常讥上海是四不像，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无所可而又无所不可的怪物，这正是将来文明的特征。将来文明要混合一切而成，在其混合的过程中，当然表现无可名言的离奇现象。但一经陶炼，至成熟纯净之候，人们要惊叹其无边彩耀了。〔2〕

所谓的“四不像”，所谓的“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无所可而又无所不可”，就是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就是异质文化和谐相处。

研究如此复杂的城市生活，从多时段、多角度、多侧面切入比较理想。为此，本丛书在卷目设计方面，既有以空间为维度展开的，也有以职业、阶层为维度展开的，还有以国别、民族为维度展开的。各卷关注点以广义的社会生活为主，包括人们的居住、饮食、衣饰、交通、娱乐、交往、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工作环境、工作特点、收入、消费等方面，兼及其政治态度、精神生活。

本丛书以研究近代上海为主，兼及古代、当代上海。古代上海是近代上海变迁的基础，当代上海是近代上海的延伸。1949年以后的上海城市生活，其变迁起伏，与整个中国城市生活变迁起伏的曲线基本一致，影响城市生活变迁的函数，时代因素重于区域因素，但是，上海仍然有其自身特点，有其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精神。这是本丛书将古代、近代、当代连通起来进行研究的原因。

历史研究需要关注宏大叙事，也需要关注日常生活。如果能够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在关注宏大叙事时兼及日常生活，在关注日常生活背后有宏大叙事意义，则更为理想。本丛书汇集这么多学者花这么大精力集中研究上海城市生活，除了上面所述的学术因素，即上海城市生活的极端复杂性强烈地刺激了我们的研究兴趣，我们还有

一个奢望,就是通过这项研究的展开,试图探究一下彼此悬殊的异质文化,在相对平静的状态下,是如何相遇、共处、交流、融合的。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是一个全人类已经面临、无数学者正在关注的重大问题。

这是因为,历史行进到信息时代,波音飞机、高速列车,极大地提升了人类个体流动的速度,手机、因特网,极大地加快了人类信息传播的速度,古人所臆想的千里眼、顺风耳、飞毛腿也都已成为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员交流、信息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便捷,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之间的理解、尊重、共存,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重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在全世界引起那么大的反应,与其说是源于人们对文明冲突的担忧,还不如说是源于人们对文明对话、文明和谐的冀盼。历史是现实的老师,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总爱向历史请教,从历史中汲取养分。于是,异质文化解读史、异质文化交流史受到学界的空前重视。在这方面,近代上海是难得的个案。以近代上海与今之世界相比,同构、相似之处极多。近代上海实为一小世界,今之世界实为一大上海。

本丛书总的框架、卷目由我设计,各卷内容由作者独立完成,我既不参与其章节设计,也不负统稿之责。

本丛书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各卷作者多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专业研究人员,也有复旦大学等其他单位的学者。多年来,课题组成员先后承担过“上海通史”、“上海大辞典”、“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上海外国文化地图”与“外语文献中的上海”等多项国家与上海市课题,多次参加国际、国内各种类型的研讨会,对所研究对象以及中间成果进行交流、讨论,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本丛书是课题组成员多年来集体攻关的智慧结晶。此

前,我们已经出版了一套《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凡 25 种,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这套《上海城市社会变迁丛书》,风格、体例一如前书,唯涵盖范围更广,社会期待更高,出版要求更高,我们也只有更加尽心,以为回报。

2013 年 6 月 12 日

注 释

[1] 石海山等著,朱荣发译:《挪威人在上海 150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0 页。

[2] 新中华杂志社:《上海的将来》,第六六条,中华书局 1934 年出版。

目 录

| | |
|-----------------------------|-----|
| 总序 | 1 |
| 导言 | 1 |
| 一、分娩卫生与“现代性” | 1 |
| 二、分娩的医疗社会史研究 | 7 |
| 三、本书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 | 23 |
| | |
| 第一章 分娩卫生与富国强种 | 39 |
| 一、作为动员策略的分娩卫生 | 40 |
| 二、作为卫生行政的分娩卫生 | 57 |
| 三、小结 | 77 |
| | |
| 第二章 分娩卫生与近代西医产科学 | 92 |
| 一、西医产科学在近代中国 | 93 |
| 二、近代上海的助产教育——以助产学校为中心 | 106 |
| 三、产婆训练 | 119 |
| 四、小结 | 138 |
| | |
| 第三章 分娩卫生与助产士 | 148 |
| 一、职业神圣感与医学技能的养成 | 149 |
| 二、助产士职业的困境 | 155 |

| | |
|-----------------------------|-----|
| 三、上海市助产士公会 | 178 |
| 四、小结 | 182 |
| | |
| 第四章 分娩卫生与医疗化 | 194 |
| 一、近代上海产科机构 | 195 |
| 二、分娩行为医疗化 | 212 |
| 三、分娩医事纠纷 | 222 |
| 四、小结 | 233 |
| | |
| 结语 | 240 |
| | |
| 附录 | 257 |
| 一、近代杂志上有关孕产卫生常识的文章篇目 | 257 |
| 二、《供孕妇参考之保健表》 | 266 |
| 三、《妇幼卫生展览会》 | 269 |
| 四、南京国民政府有关助产人员的行政法规选录 | 272 |
| 五、《上海特别市卫生局办理助产士注册规则》 | 278 |
| 六、《卫生局改进妇婴卫生》 | 279 |
| 七、《助产学校立案规则》 | 280 |
| 八、《上海同德产科学校章程》 | 281 |
| 九、《同德妇孺产科医院简章》 | 284 |
| 十、《一套外出接生用品细目表》 | 285 |
| | |
| 参考文献 | 288 |
| 后记 | 310 |

导 言

一、分娩卫生与“现代性”

在有关近代中国的研究中,分娩卫生的发展状况及其所担当的社会角色尚未得到系统的阐释。“分娩卫生”本身是一个医学范畴,属于“妇婴卫生”的一部分,是妇婴卫生中与妇女分娩有关的内容。^[1]它既包含了知识技术层面的产科医学,也包括制度层面的产科医疗实践。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西方产科学知识被引入以作为降低妇婴死亡率的重要资源,新式助产法(新法接生)以及围产检查成为政府卫生行政的重要内容;与此相应,助产教育得以开展,产科医疗保健机构陆续创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分娩卫生可以理解为产科学知识转化为医疗实践的对应点,其核心内容就是以消毒为核心技术的新式助产法,以及预防医学视野下的围产保健。^[2]

医学史家通常将分娩卫生或更广范围的妇婴卫生置于医学发展史的脉络下展开研究,关注医学技术与观念的发展、变革。相应地,分娩卫生的历史发展则以妇产科的形式来加以阐述,在这种叙述框架中,线性的时间顺序及重大历史事件成为主要特征。这些研究成果尽管提供了探究历史的线索,但却容易遮蔽历史的多种面向。^[3]

与这种侧重梳理学科知识本身发展历史的“内史”书写方法不同,医疗社会史作为研究科学在社会中的发展史的一种“外史”,成为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其中,有关中国传染病史的研究成果颇丰。^[4]这部分受到西方新史学(特别是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研究趋向的影响,部分源自对现实公共卫生体系的关怀。20世纪70年代西方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出现,与40、50年代医学社会学的兴起,特别是60年代以后医学人类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学者们逐渐摆脱对结构、规律和因果关系等的过度追求,而表现出对人本身的关注以及对呈现人类经验的重视。在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衣、食、住、行等社会方面的内容日趋受到关注。医疗社会史可以说是史学界内部一种新的探索与自觉的学术追求;同时,2003年爆发的SARS(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也警示着中国所面临的种种严重的医疗卫生问题,一些学者也深刻认识到开展相关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必要性。^[5]

伴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都市公共卫生与社会医学自18世纪中期开始在欧洲各国迅速发展。公共卫生致力于通过社会共同努力,改善公共卫生环境(固体垃圾、液体垃圾以及粪便的处理)、公共食品卫生、公共饮水卫生等,灌输个人卫生知识,促进医疗发展以及对传染病的防治等。公共卫生计划的最高出发点是增强个人健康,同时,公共卫生的发展不仅是从人道主义,而且也是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出发(工人和贫民的生活状况迫切需要改善),需要国家与社会承担起责任。现代医学的特性也在现代卫生法规和公众保健、预防措施和公共卫生等方面明显表现出来:“这种医学从医治个人疾病进展到关怀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医学思想的进步,这种保健目标日益扩大的卫生立法的进步,以及医学活动的范围从治疗疾病进而转向预防疾病,这些就是现代医学的特点与决定性因素。”^[6]

与此同时,现代医学作为一种“现代化”的启蒙工具伴随着殖民主义而输入到欧洲以外的其他地方。沿着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生命权力”(bio-power)的理论路径,很多学者提出殖民医学(colonial medicine)或帝国主义医疗(imperial medicine)的观点。李尚仁对殖民医学的发展有一个简单的回顾:

殖民医学最初也最重要的任务是维护军队、官员、商人、传教士、拓殖者等帝国先锋的健康,使其能有效执行殖民任务。等到殖民过程深化到一定程度,为了有效利用当地的资源,加上殖民者也开始视当地人的劳动力为重要资源,以及夹杂了文明任务(civilizing mission)的帝国思维,殖民医学开始进行当地环境卫生改良与从事当地人的医疗保健工作,其介入性格愈益强烈,与当地社会的互动和摩擦也更加深入频繁。此外,殖民当局也对当地人展开医学卫生宣导教育,甚至培养当地的医疗人才。〔7〕

可以说,西方医学作为西方近代文明的一种体现,其实是帝国主义铜板的一体两面。医疗及卫生事业是推行殖民主义最重要的工具,带有很强的殖民性。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许多医学家及动物学家推动了传染病及热带医学的发展,以此为基础,在建立医疗、卫生行政的幌子下,殖民地统治得以强化。就中国具体而论,饭岛涉认为,包括日本在内的欧美各国均试图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这也是帝国医疗强行进入中国的过程。为了对抗帝国医疗,中国开始着手建立卫生事业,中国的卫生事业是在应对鼠疫流行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8〕

有关西方殖民医学的研究理论是否适用于“半殖民地”的中国,尚需进一步讨论。〔9〕尽管如此,上述研究仍提醒我们重新审视医疗

卫生与现代性之间的纠葛,重新思考医疗社会史的书写方法。毋庸置疑的是,西方医学思想、技术及相关制度的确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些现代性的“福音”,然而这并不表示现代性话语就应该成为中国医疗社会史的独一无二书写方式。抛弃宏大叙述与二元对立论,我们应该从非西方传统的社会角度来反思被引入的“现代性”到底是什么。

“卫生”一词在中国的演变或许可以成为回答这一问题的注解。罗芙芸(Ruth Rogaski)对“卫生”一词的研究显示出卫生在近代中国的复杂含义:“在某种意义上,长与专斋用‘卫生’这个词包含了福柯所谓的生命权力,一系列由国家管理生命的技术和‘政府极权’,即个人应内化于政权的规训,使个人行为与国家目标相一致。”^[10]整个20世纪,卫生成为一种形成中国精英现代理想想象的工具性话语,通过这一工具,他们希望国家、社会和个人能够被改造。换言之,卫生不再是《庄子》里所谓的个人养生问题,而是将整个民族提升到健全的现代文明的需要,已然成为公共领域的事物。与健全相对立的疾病也超越了病理的肉体层面,成为一种文化的隐喻载体。正如杨念群所说:“疾病作为一种隐喻不仅塑造了中国人想象自身与世界的方式,而且也同时建构出了中国在建立现代国家时所采取的行为技术和制度体系。”^[11]

在现代国家的建构中,女性是颇受关注的群体,是各种话语争相表述的对象。笔者很难在这里对这些话语一一进行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生育话语与现代国家建构这一目标之间的关联十分密切。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每况愈下的国际地位与积弱形势,特别是1895年在甲午之战中完败,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越来越多地通过媒体传达出来。从严复《天演论》所衍生出来的“强国强种”理论,不仅在清末民初受到知识分子和改革者的重视,同时也影响了北伐后的